

地區的儀式之中？即使在同一地區和同一族群，儀式是否會因所觸及的不同文化以及政策而有細微的差異？儀式的執行是否會因儀式專家的差異而有所區別？這些均是值得更進一步深究的議題。

康豹對湘西的興趣源於凌純聲與芮逸夫在1947年所發表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該報告為康豹的田野調查打下基礎。凌純聲與芮逸夫將苗族的儀式進行分類，為外來的客教儀式與本土的苗教儀式，還雛願儀式被歸類為外來的客教儀式（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頁128）。康豹在此基礎上提出還雛願儀式是漢族和苗族傳統的結合，並且至今流行在苗族、土家族，以及漢人的社會中，是對苗族儀式與道教文化融合的進一步研究。伴隨着康豹著作的出版，以「跨雜糅性」的視角理解地方信仰的存續和演變，對於西南的儀式研究有深遠的意義，希望有更多關於西南的儀式研究可以更進一步推進這一概念。

臺灣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民族系
鄭涵

***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 Transitions in Elder Care.* By ROSE K. KEIMIG.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21. 208 pp.**

年歲增長(aging)與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之間的關係被納入現代化探討語境中展開，老年人喪失權力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沈奕斐，〈「後父權制時代」的中國：城市家庭內部權力關係變遷與社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43—50），而這種權力喪失則被視作現代化的結果(D. O Cowgill,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A Revision of the Theory,” in *Dimensions of Aging*, eds. J. Hendricks and C. D. Hendricks. Cambridge: Winthrop, 1979, 54-68)；現代化「抹黑」(tarnish)了老年人的形象，並降低了老年人的社會地位(Nelson Chow and Xue Bai, “Modern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Older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Image and Statu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54 (2011): 800-815)。老齡化研究脈絡下，過往研究多塑造老年人的被動形象，描述他們無法接受自身無為的狀態，極端者甚或走向自殺（劉燕舞，〈農村家庭養老之殤：農村老年人自殺的視角〉，《武

漢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4期，頁13—16）。不同於既有研究脈絡對農村老年人境況的偏向，Keimig 着力透過當代中國城市老年人養老照護問題及變化來窺視這一命題，聚焦於入住養老機構的城市老年群體視角，在中國極速變遷的歷史中理解養老照護觀念轉變的脈絡。以往老齡化研究多從子女一輩的視角展開，由是形成了「老年人即負擔」的觀點，這種視角在某種程度上也同時剝奪了老年人的自主性與尊嚴（陶濤，〈論老年人的幸福與美德：兼議西塞羅的老年倫理觀〉，《江海學刊》，2022年，第3期，頁43—51）。對此，Keimig 帶着「將自己浸入他者世界」的專業宗旨，來到雲南昆明的養老機構，展開城市老年人的照護(care)問題研究。

在中國老齡化進程中，經濟上「未富先老」，照護提供層面，又因居處模式、家庭結構的變化，弱化了家庭照護的能力，致使老年人尤其是城市老年人對於自身能接收到的照護充滿未知與不確定性。然而，身處這一轉變過程中的老年人，他們並非制度或政策的被動接受者(*passive recipients*)，而是努力做出改變來調適於個體化進程。Keimig 轉向老年人的視角，從他們的生命史來理解這種自願進入照護機構的養老選擇，由此闡明當代中國老年人湧現的新的主體性。Keimig 於2013—2015年間兩次來到昆明進行田野調查，深入雲南昆明的兩個私營養老機構、一個雲南西北縣城的福利院、一個雲南大型公立醫院的老年人病區以及一個上海高檔私立養老中心，分別對20個照護工作人員、33個老年人進行訪談，同時拍攝了6個探訪記錄視頻，試圖描繪出在當代中國，新興的長者照護形式、以及成為老年人、孝順的孩子或照護者的新路徑；從老年人的視角，將老年和照護的日常經驗置於大眾視野。

全書包括導言、結論和6個章節。導言部份首先呈現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境況，從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脈絡理解老年人照護，21世紀初正值年老的一代，他們歷經抗日戰爭、改革開放等一系列變革，作為被允諾「奉獻與犧牲將會得到補償」的一代人，卻在步入老年後陷入「由誰來照護」的抉擇。梳理既有機構養老的研究脈絡後，Keimig 主張需看到老年人本身具有的能動性與積極性；在權力和主體性理論框架下，用「新興的主體性」(*emergent subjectivity*)概念來理解老年人變化着的觀點、期待和意願，並以此描述老年人捲入其中的關係——即老年人自身、他者與更大的歷史與社會進程之關係。

第一章「孝順的子女、仁慈的父母」透過父母—子女關係來理解當代中國浮現出的老年人照護境況。針對閻雲翔主張的「在市場化與個體化進程中出現了父母權威與孝道的祛魅」（閻雲翔著，龔曉夏譯，《私人生活的變

革：一個中國村莊裡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Keimig 認為，孝道在變動的社會中保留下來，但這種存續關涉來自子女與父母之間圍繞關於孝順的期待與實踐展開的協商、詮釋與重想之努力；她從儒家家庭倫理基礎的闡述開始，呈現它們在如何在數百年間持續形塑集體意識和社會結構；同時指出雖然歷史上及當代關於「孝道」的論述豐富多樣，但在靜態視野中，「孝道」始終對父權期待的結構和傳統義務做出約束。因此，需將孝道視作更大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強調和諧 (harmony) 與平衡 (balance) 體系的一部份。在老年人看來，父母—子女關係並非嚴格的責任與義務，而是彼此之間相互給予的無盡互惠帶來的和諧與平衡；進養老機構也並非子女不孝順，更像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相互給予的慷慨。人口流動、個體化以及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子女無法兼顧支持老年人的孝道理想，於是老年人主動採取具有保護性的策略來維繫父母—子女關係，由此展現了老年人在社會變遷中，不僅是積極的回應者亦是有行動力的貢獻者。

第二章和第三章則從時間和空間層面來釐清當下中國老年人照護轉變的動力。第二章在更大歷史範圍情境下，描述當今中國老年人照護發生的變化，揭示年老和老年人照護如何被經驗，倚賴「具身性」(embodiment) 觀念，勾勒歷史事件如何被不同代際歷經的複雜方式，以及透過特定的故事展示這些歷史事件如何持續形塑當下的年老和照護經驗，以此探索當代中國社會老年人主體性的新形式、重想在中國變老的路徑。老年人經歷的歷史不僅僅作為記憶，更是滲入他們的精神、身體之中，持續對當下的經驗產生影響，這些歷史變革為全新的老年人主體性的出現做鋪墊；新的意識形態和技術變革重塑了老年人對家庭照護的期待和他們選擇進入照護機構的決定。1949年作為一個分水嶺，昭示了中國社會從傳統的「父子主軸」轉向以夫妻為關係為核心（許烺光著，王芃、徐德隆譯，《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2001）。由是傳統父母所期待的與子女之間的互惠隨着土改、大躍進、「文革」等歷史變革的發生而減弱，這些歷史事件已然發生在過去，但它們始終揪扯着走向未來的身體，而這些歷史，也正因其「具身化」，才得以始終重塑人們的過去和未來。毛時代結束，個人與集體鬆綁，人們開始邁向「自我負責」的狀態，對於老年人而言，老年人主體性的傳統形式已然難以實現，於是出現各種各樣的養老可能，老年人主體性的新樣式開始興起；新舊主體性的交替對於老年人而言雖積極卻也無奈，即使跟上個體化的腳步很難，他們也只能說「如果不做出改變，那又能怎樣呢」。

第三章立足段義孚有關地方(place) 與空間(space) 概念的區辨——空間是「缺乏意義的領域」，地方則是「讓人感到價值存在之處」(陳伊喬、劉逸，〈段義孚的人地情感研究對城鄉規劃的啟示〉，《城市發展研究》，2019年，第8期，頁104—110) 由此深挖中國養老機構中空間與地方的關係，強調空間性的組織反映、形塑和建構身體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且當無差別的空間變成有意義的地方之後，將會為新的空間注入生命力。5個不同類型養老機構呈現出想像的與鮮活的、具體的與抽象的不同對立層面間的緊張，亦勾勒出老年人照護的景觀(landscape) ——中國養老照護機構並非同質的，更像是一個變動的處境。在當代中國，市場化和私營化掌握了將地方轉為空間的權力；而養老機構內部異質和不平等的碰撞則能帶來文化和權力的新的安排，也因此將養老機構打造為具有歸屬感的地方；然而，在養老機構中，不論老年人還是照護者，他們都缺失了界定和控制自身身處空間邊界的能力，伴隨「無地方感」(a sense of placelessness) 的產生。在身體和行動之外，時間亦是形塑空間的力量，且對時間和空間進行控制的權力主體之間存有交疊的部份，它們共同建構了老年人與照護者那種日復一日的例行程式(routine) 。在作者看來，一個地方即「一個價值的凝固」，她認為養老機構本身價值的衡量，要考量養老機構照護讓老年人家屬全心投入工作的效能產出。

第四和第五章描述中國歷史上和當下老年人照護的多樣形式，着力探尋中國老年人照護中的揪扯(entanglement) 。從追問誰應該提供照護、以何種方式以及為何如此開始，透過日常的照護案例闡明在家中、社區和機構提供照護的多層維度如何被運作。首先分析中國語境中對照護(care) 的界定及期待，隨即呈現當今老年人照護中的多元維度，強調照護是一種勞動力的形式，也是一種禮物的交換，是一種具身化的體驗，其最終是為了改善生命體驗。傳統中國社會中，兒媳是提供照護的主力；1980年代後，伴侶照護、自我照護成為老年人照護的主要形式，此外，城市社區志願組織替代了傳統鄰里間的支持；老年人自己或相互照顧，將小孩從傳統照護中解放出來，而護工則補足了傳統照護中兒媳的空缺。Keimig 從養老機構的日常來理解「何為高品質的照護」。作為照護的提供者，時間於護工而言是最稀缺的資源，由此導致身體任務為中心的照護凌駕於以人為本的照護；在照護需求遠高於照護資源的情境下，老年人家屬多通過將心比心等個人性的方式來對待護工，以換取他們持有的照護資源；照護機構也建構各色管理標準來保障照護品質；政府出臺保障護工權益的政策，但依然難以避免照護品質參差、照護監督難以實現的困境。

最後，全書以養老機構照護陰暗面的呈現來結尾，作者意圖基於對養老機構陰暗面的描述，描繪那些生命被困在無盡變革中的人們完整的經歷。「難以治癒的生存」(chronic living)這一概念用以描述遭受各種疾病困擾的老人，它作為「健康生活」(healthy living)的對立面，不簡單指因疾病而產生的對生命的一種不期待的狀態，還指當生命本身變成不受歡迎狀態時而產生的情形。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的死亡觀念來理解中國的境況，Keimig 指出，中國有關死亡的哲學缺乏極端的生—死二元對立，它更強調關係性、互惠性均衡以及與自然節律的和諧，「死得好」作為關於死亡的中國式理解之標準，在現代社會中已然被沿襲；但「走得好」的實踐則在養老機構遭受無數阻難；於是，對那些生又不行、死又死不了的老年人而言，生命是極端痛苦的——長久的忍受和緩慢的過程合鑄了「難以忍受的生存」，它裹挾在身體、認知、心理和社會性各個層面的喪失。「沒辦法」便成為他們對自身控制或改變之權力有限性的表述。

結論中作者重申過於聚焦年輕一輩的視角是既有老齡化研究脈絡的不足；將當代中國的這些老年人置於歷史情境中來看，他們真的是「可憐的一代」；但 Keimig 也旨在透過本文的研究讓大眾看到，在極速社會變遷中，老年人面臨無數的失衡(imbalance)，可他們仍在努力建構適應變遷的秩序，為維繫父母—子女關係的平衡與和諧，他們始終在做出努力與犧牲。在中國社會的變革進程中，就如黃永玉畫中那只半閉眼睛的貓頭鷹，正因為現代性裹挾着的風險，使得喪失集體庇護的人們無法完全閉眼安心入睡。

Keimig 從老年人的視角出發來剖析和理解當代中國老年人照護模式的轉變，作者通過田野調查收集的資料來「修正」我們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老年人進入養老機構的選擇不能簡單等同於傳統孝道的式微，透過時空層面的剖析——回溯老年人歷經的重大社會變革、描述老年人在養老機構內對抗空間無意義性的努力，呈現他們作為能動的主體，如何透過鍛煉、自我照顧等建構自身新的主體性。「衰老」、「死亡」理解的主位元視角勾勒出在極速變遷中老年人陷入的矛盾與無奈，他們積極調適於變化，但他們的這種努力常常有追趕不上「個體化」進程的趨勢——衰老伴生的社會性死亡才是他們最無力應對的創傷。

玉溪師範學院法學院

楊梅